

暨南史学丛书



近世区域商人与商埠论集

黄忠鑫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近世区域商人与商埠论集

黄忠鑫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世区域商人与商埠论集 / 黄忠鑫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3 - 1976 - 8

I. ①近… II. ①黄… III. ①商业史—中国—文集 IV. ①F7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553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沈丁晨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汉水中下游的商埠格局

引言	(3)
第一章 汉水中游商业中心的变动	(5)
第二章 汉水下游的商业市镇发展	(33)

第二编 福州南台商业碑刻研究

引言	(55)
第一章 从神庙到会馆:商人群体的活动基地	(73)
第二章 古田会馆开支与商帮发展趋势的互动	(88)
第三章 商帮力量兴替与绥安会馆运营的关系	(101)
第四章 两浙木商与福州木材市场秩序的构建	(114)

第三编 清代旅粤婺源商人传记

引言	(131)
第一章 徽州商人与广东口岸贸易	(138)
第二章 旅粤徽商家族的社会活动	(155)
结语	(169)
附录 《婺源县志》所载旅粤商人传记汇编	(171)
后记	(215)

第一编 汉水中下游的商埠格局

引 言

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全长 1497 公里。从汉口溯江而上，可以通航至陕西南部，水运便捷，在传统时代具有天然的交通与商业地理优势。清代民国时期，汉水上的人群、物流络绎不绝，沿线形成了诸多商业城镇。随着经济结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这些商埠格局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以汉水中下游的湖北为例，笔者对以下两类现象颇感兴趣。

其一，在一般的认识中，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代，汉水中游的商业当以樊城为翘楚。然而笔者在检索近代文献时发现，在樊城西北面、同处中游的老河口竟一度被称为“鄂北商埠之冠”“鄂北第一大城市”“襄河商务惟一之繁盛巨埠”“陕南川北及豫鄂西边一带之经济中心”等，樊城则黯然失色，记载甚少。由此可见，近代汉水中游地区的商业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关于这两个商埠的研究较为缺乏：苏云峰已经注意到在汉江中上游以老河口与樊城同为商业贸易中心，但是并没有展开具体的研究。^① 鲁西奇分别比较襄阳与樊城、光化与老河口各自的关系，着眼于传统政治城市城墙之外的厢坊、市镇的发展，而没有论及同为商埠的老河口与樊城之间的关系。^② 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近代以来何以普遍出现了老河口较之樊城更为繁荣的社会印象和事实，其原因值得细究。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 年版，第 41 页。

② 鲁西奇：《“双子城”：明清时期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的空间形态》，载张建民主编《10 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其二，近代湖北商贸兴盛，其中又以“八大镇”为著：汉口、武穴、沙市、新堤、仙桃、沙洋、樊城和老河口。有趣的是，除汉口外，汉水沿岸的商业重镇达到四个之多，足见当时汉水流域商业发展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四大镇都对原有的地方政治中心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仙桃取代沔阳、老河口取代光化成为新的县级治所；樊城则是与襄阳合并，实现地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合一；沙洋则是数次升格为市（县），又一度并入荆门，今为沙阳县。无论如何，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地理对于经济地理变动的调适，导致城镇格局变化的经济动力又是如何，也需要进行讨论。

第一章

汉水中游商业中心的变动

本章试图围绕樊城和老河口各自的商业发展历程、贸易网络及相互关系，对清代以来的汉水流域商业中心的变动现象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近代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 清代樊城、老河口的商业网络

樊城较早形成大型聚落，在唐宋以前即有数次建县。宋元以来，樊城的政治军事色彩有所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其经济功能的凸显，尤其是沟通南北商品交流的商贸机能。清代，樊城在时人眼里的形象依旧是五方杂处、商品荟萃之地。“樊城踞汉水北岸，控滇黔秦蜀豫数省之冲，舟车四达，商旅辐辏，屹然为楚北一巨镇。”^①然而，樊城的商业结构及其在整个汉水流域商业的空间关系，在政书、方志、文集等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并不明晰，这也是以往学界对于这一商埠的研究极少的关键因素。而樊城山陕会馆留存的诸多清代碑铭，却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樊城商业情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②

樊城山陕会馆创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历经多次扩建和重修（见图1—1）。其中，道光三年（1823）进行重修并创设茆萼宫，规模巨大，集资万两而成。按照以往的惯例，此次会馆的扩建留下了

①（清）贺熙龄：《樊镇新堤记》，载（清）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8《工政》，图书集成局1888年刊本，第8页a。原碑现藏于襄阳市米公祠石苑。

② 笔者于2010年初造访樊城山陕会馆（今襄阳市第二中学），抄录所存清代碑铭共计十七通。



五通碑铭以“流芳千古”，其中一通为《重修山陕会馆并创建荧惑宫碑记》，其中强调了山陕商帮是樊城商业的重要力量：“襄樊制重地也，为山甫遗封，当水陆之冲，舟车往来，无不投憩。而经商股贾谋业于其间者，惟我山陕贸集盛焉。”而经过扩修，会馆“辉煌崇隆，真足超古而迈今，不亦极一时之大观也哉”，至今山陕会馆仍是樊城最大的会馆。其余四通碑铭分别为“百世其昌”“福缘善庆”“永垂不朽”“方福攸同”，皆为山陕商帮所经营行业的捐输名录，记录了清中叶山陕商帮在樊城的经营内容和地域范围。从会馆的建设规模可以看出山陕商人在樊城商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通过山陕商帮的经营内容、范围与规模等信息，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樊城这一商业重镇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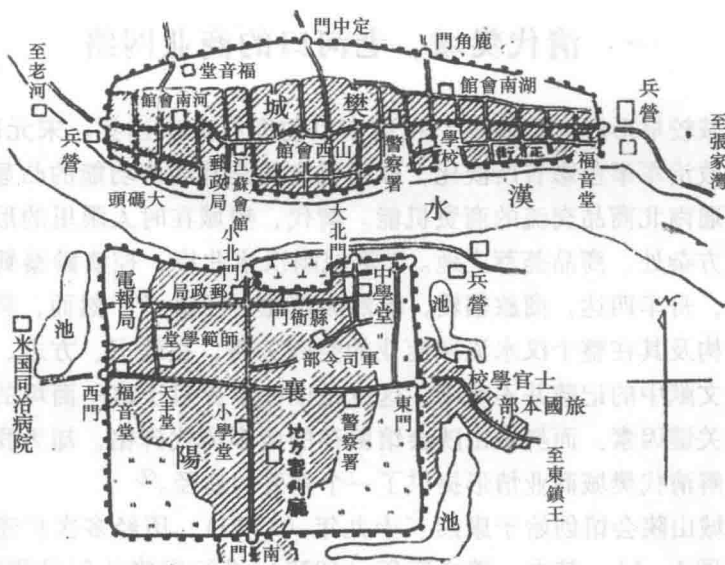


图1-1 20世纪初的樊城与山陕会馆（山西会馆）坐落

资料来源：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湖北省》，1918年，第133页。

第一，四通碑铭记录了樊城的各行商号的名录。“方福攸同”碑皆为山货行，共计429家。“百世其昌”碑记录的行业最多，包



括当行 16 家，汉中帮 167 家，义长会 5 家，虔诚会 10 家，立兴行，汾酒行 54 家，铁货行 4 家，铜货行 6 家，布行 11 家，木客 18 家以上，^① 靛行 11 家，草帽客 21 家，钱行 1 家以上，京货行 2 家，老汾酒行 4 家，染坊 4 家；此外还有土帐行、力行、草绳行、灯笼铺、花行、料铺、醋坊等皆为 1 家，以及个别不明行业商号。“永垂不朽”碑刻有南货行 18 家、估衣行 53 家、府城会 36 家、陕西衣庄 93 家、西货行 33 家、骡店 5 家、外粮行若干、外船行若干、过载行 4 家以上、山货铺 10 家、毡帽行 22 家、三元店若干、皮院 21 家以上、门估行 2 家。“福缘善庆”碑则有三义行 35 家、粮行 251 家以上。

不考虑“会”和汉中帮等并不是按照行业划分的商号，^② 山陕商帮在樊城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既有食品、衣服等生活用品，也有钱庄等金融业、过载行等运输业，还有汾酒行、西货行、南货行、京货行等山陕、南北各地的土特产业，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可视为清代樊城商业的基本内容。一些行业内部也有所区分，如汾酒业分为汾酒行和老汾酒行，山货业分为山货铺和山货行，反映了行业发展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即便如此，山陕商帮的经营还是有明显的主导行业，即粮食业和山货业。这两个行业不仅商号数量在各业之中遥遥领先，而且在捐输金额上分别达到 1321 两 5 钱和 1767 两 3 钱，也为其他行业所不及。

第二，“福缘善庆”碑所记数百家粮行商号，还以小字标注出所属的府、县、镇，而“永垂不朽”碑的陕西布庄 93 个商号也分别注明这样的信息。将这些地名进行归类，可以初步判定樊城商业影响的范围。

粮行，樊城本镇的仅列有 3 个商号，后又有“众号”字样，当不止 3 家。此后共列出 37 个地名，其中在襄阳府的有太平店（众号）、

① 樊城山陕会馆的建设费用的征集属于自愿认捐性质。碑刻上列有木客商号 18 家、后又有“众号”字样，是为 18 家商号以外，还有一些商号共同集资凑为一份之意，故文中表述为 18 家以上。以下皆同。

② 关于樊城山陕会馆碑刻内容的考释与研究，如“会”的名称与性质，应当有专门论文进行讨论。本书仅选取其中关于历史商业地理的信息展开研究。



双沟（众号）、东邑（2个以上）、老河口（3个以上）、茨河（众号）、武安堰（1个以上）6处；安陆府的有安陆府城（即钟祥县城，5个）、转斗湾（众号）、旧口（2个）、岳口（众号）4处；荆门直隶州的沙洋（1个以上）、德安府的随州（众号）与汉阳府的汉口（众号）各1处；南阳府的唐河县城（36个以上）、马家店（3个）、源潭（46个以上）、下屯（3个以上）、郭潭（3个）、同河（众号）、礼东（2个以上）、赊旗店（89个以上）、岗头（3个以上）、沙堰（6个以上）、禹王店（1个以上）、清华（2个）、歪子里（3个以上）、南阳府城（众号）、邓州（众号）、冯家集（1个以上）、三十里屯（2个以上）、新店铺（众号）、新野县城（3个以上）、王家集（3个以上）、急滩（3个以上）、界塚（6个以上）、瓦店（13个以上）共23处。此外尚有“新集”1处难以确定坐落。

陕西布庄，樊城多达51家，此外襄阳府的有太平（2个）、双沟（1个）、老河口（14个）、谷城县（3个）、均州（6个）5处；鄖阳府有府城（1个）和上津（5个）2处；陕西的汉中府（2个）和兴安府（6个）。另有“里关”未能确定坐落。

综合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在传统时代商业中占重要地位的粮食业，同样是樊城商业的一大支柱。樊城粮行的影响范围主要沿汉江及其支流唐白河流域分布。

汉江干流上达老河口、下至汉口。其中，著名的粮食输出地是谷城县茨河镇。“茨河之米，蜚誉鄂北各县。满清中叶，曾输米京都，作贡献皇室之需。且每年输出，当在数万石以上，汉水中部沿岸各县，多仰给于是焉。”^①而其他诸如老河口、东津、太平店等地，可能皆为粮食输入地或转运口岸。

唐白河流域主要包括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新野县、唐河县和邓州四个县份，最北达到赊旗镇，这一流域的粮行数目众多，占据捐助会馆建设的粮行总数三分之二左右。由于河南基本属北方旱作粮食区，又是华北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区，而湖广一带以水稻为主，故

^① 紫铭：《鄂北十三县的现状和今后应兴应革的刍议》，《新鄂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



有研究表明,北方杂粮的输出、南方稻米的输入是赊旗镇粮食业经营的重要内容。^①例如,这里出现的源潭,就是著名的黄豆产地,且商家信誉可靠,有俗语称:“不会买货到源潭,不会卖货到汉口。”^②

实际上,将研究范围扩展到鄂豫两省省际贸易来看,赊旗镇往南最重要的转运节点就是樊城,两镇之间不仅存在诸多南阳府、襄阳府所辖的中小型粮食转运市镇,构成唐白河流域的粮食对流、集散贸易网络,而且通过晋商,两个商业重镇联系也极为紧密。赊旗镇对于樊城的粮食贸易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樊城山陕会馆的捐输中,赊旗镇参与出资的粮行多达89个以上。至于汉水上下游之间的粮食运输,樊城亦通过老河口向秦巴山区输入稻米,^③通过汉口将两湖平原水稻转运北方各地。

由于汉水改道的缘故,光化县下属的老河口镇于清中期方才兴起。由于“光化县城外、汉水岸边的商业屡废屡起,正说明这里存在着商业发展的强大需求”^④,老河口迅速成长为“商贾辐辏,烟火万家”,诚为“富庶之区”的商业重镇。^⑤“光化以老河口为巨镇,与樊城相望,其俗等趋贸易,虽土人不免。”^⑥在清中叶,该地就具有强烈的商贸习俗。

① 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张履鸾:《樊城经济概况》,《农林新报》第12年第26期,1935年。

③ 左宗棠即言:“东洋米价虽贱,由海口水运襄樊,脚价亦轻,本为合算。惟由老河口溯丹浙之流、小舟拨运龙驹寨改由陆路运陕西,脚费数倍于米价,再由陕运甘,脚价之多,尤不胜计。且陕西正采两湖稻米运陕救饥,水陆同出一途,运道尤虞拥挤,人畜之力亦难分济。”(《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四年三月己巳,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版,第1册,第557页)即便是官方的粮食赈济,也是选择经樊城由老河口转运入秦巴山区,乃至陕甘等地。

④ 鲁西奇:《“双子城”:明清时期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的空间形态》,第394页。

⑤ 光绪《光化县志》卷1《乡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24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135页。

⑥ 嘉庆《湖北通志检存稿》章24,《章氏遗书》卷30,嘉业堂1922年刊本,第27页b。



樊城山陕会馆中的陕西布庄业和山货业之分布，可以透露出清中期樊城与老河口关系的若干层面。傅衣凌先生已经指出，陕商以市布起家者甚多，^①布业为陕西商人的一大传统商业。而此处陕西布庄商号的地域分布，以汉水上游的鄂西北、陕南地区为主；就数量而言，樊城独占半数以上之外，其次为老河口，皆较其他地区为多。至于山货业，由于碑刻没有标出商号所在地区，可以认定这429家山货行和10家山货铺全在樊城一地。可见，在以山陕商帮为主导的西北方向的商业贸易中，清代中期的老河口已经占据一定的份额，但是较之樊城，仍有较大的差距。

清末，老河口的商品流通范围已经包括了陕南、豫西等较为广阔的地区，其商业发展之情形，在晚清民国编修的乡土志、方志等可以窥得。

第一，豫西：目前仅见光绪《浙川直隶厅乡土志》，浙川又以荆子关为主要的商业中心，输出老河口的主要是农产品，而从老河口运入的亦为当地手工业品。输出品有：猪，“民间饲养最多，除供本境食用外，运赴湖北老河口销售”；漆，“陆运赴直隶、山东等处销售，水运赴汉口销售”；柿和梨，皆为“水运赴湖北老河口销售”。输入品为：纸张，“自湖北樊城、老河口运入”；铁货，“自湖北老河口、樊城运入”；瓷器也是来自樊城和老河口。^②

第二，陕南：安康、汉中、商洛等地区皆有与老河口通商。

城固县，“商务以姜黄、木耳为大宗。姜黄每年产一百余万斤，陆运销行甘肃秦州十之一；又水运销行于湖北老河口镇十之九，由老河口镇分水运、陆运，销行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以为制造水烟之用”^③。

平利县的山货，皆须经过安康（兴安府）输出老河口等地：漆，“东道者至湖北竹山县田家坝，由西道者至兴安府，皆运河口、上海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② 光绪《浙川直隶厅乡土志》卷8《物产录》，《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线装书局2002年影印版，第5册，第259、263、279页。

③ 光绪《城固县乡土志·商务》，《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64号，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56—57页。



行销。多为日商买去”；木耳，“由兴安府运河口、汉口、上海等处行销”；当归，“由兴安府运河口、汉口、上海等处行销”；党参和漆油，“由兴安府运河口、汉口等处行销”；桐油，“由兴安府运河口等处行销，多为船户购用”^①。此时，桐油仅仅是老河口码头修船的用品，尚未成为大型输出品。

洋县，销地为老河口的山货有木耳（六七百包）、花椒（约五百包，含四川）、肚倍（约二百包）、姜黄（约两千余斤）。^②

木耳是镇安的大宗输出品，“水运由襄河至老河口转运汉口，陆运由蜀河等处商人坐庄收买，每岁销行约七八万觔”。另有五倍子“销行老河口及蜀河各路，每岁约百数十石”^③。

西乡县，“纸厂多设巴山深处，以竹为料，甚惜工劣，不能与洋纸抗衡耳，陆运陕西及山西等处，水运兴安、老河口等处”。另有莱药水运老河口千斤以上。^④

洛南县也主要是杂药贩运河口：“昔岁如柴胡、连翘、桔梗之类，惟境广生者，每有外商入境收买。近则雒民亦渐知趋利，闲时采缀在家，有隙则担运出境，在荆紫关、老河口一带售卖，获利较前尚多。”^⑤ 商南县较为特别，输出品是丝：“水运行销老河口等处，陆运运销行南阳府等处。每岁约出五百觔有奇”。^⑥

以上表明，老河口商业在清末已经粗具规模，辐射范围已经涵盖豫西陕南等地，成为鄂豫陕交界地区的商业重镇。豫西输出老河口的

① 光绪《平利县乡土志·商务》，《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线装书局2002年影印版，第5册，第799—801页。

② 民国《洋县乡土志·商务表》，《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15册，第379页。

③ 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商务》，《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80号，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163—164页。

④ 民国《西乡县乡土志·商务》，《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15册，第548—551页。

⑤ 光绪《洛南县乡土志·商务》，《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50号，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172页。

⑥ 光绪《商南县乡土志·商务》，《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14册，第325—326页。



主要是农产品，陕南各地则以输出木耳、生漆、姜黄、杂药等山货为主，有极少数的手工业品输出。这一点，在清末的厘局统计中也是吻合的：在1904年度，从陕西进入老河口的货物中，实征税额超过1万钱的有丝麻、土烟膏、黑木耳、黄表 and 皮纸，其次为牛羊皮、桐油、漆油、姜黄、火纸、草绳等，皆为陕南土产山货。^①而老河口输往各地的货物，这一时期的记载并不明确，应同豫西的情形一样，皆为由汉口输入、经老河口转运的加工品、洋货等，包括少数鄂北本地的手工业品。

在晚清的时人印象中，“老河口为湖北大镇，不亚樊城”^②。在经营地域上，老河口也与樊城有了较大的分异。清末徽商在店铺经营范围的划分的议单上，就显示出这样的差别：

一、议樊城新、老店生意，上至南阳府属，下至南漳[漳]县、安陆府属、襄阳府考棚，均归樊城店赶考、发货，他店不得越境背议。

一、议河口店生意，上至兴安府、均州及郢阳府考棚，下至谷城，均归河口店开张发货，他店不得越境背议。^③

由于老河口商业地位的上升，徽商在对鄂西北的经营中，也已经将老河口与樊城置于几乎对等的地位设立店铺。与前述的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相比，清末老河口商业的发展主要以水运为纽带，以吸纳陕南、豫西土产与山货为重点，辐射范围已较之兴起之时大大扩展，商业规模逐渐接近樊城。

①（清）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入境货物》，《关中丛书》第4辑，陕西通志馆1935年版。

②（清）唐晏：《庚子西行纪事》，《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册，第327页。

③《四友公议各章》，清末抄本一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私人收藏并惠赐复印件。



二 民初以后汉水中游商品流通结构的转变

民初以后，汉水中游的商品流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棉花和桐油开始取代粮食和山货，成为最主要的商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樊城和老河口在地区商业上地位发生了变动。1935年湖北航务总局的工作人员沿着汉江而上调查各地经济状况，在调查报告中，樊城和老河口在商品输出品种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

……复上至东津湾，出口大宗物品为杂粮、棉花、麻油、油饼，进口货物稍有。再上至张家湾河口，地距市镇五里，为白河、唐河、滚河入襄河之总口，出入货均甚辐辏。出口以大豆为最多，年均一万五千余石。汾酒、麻油、棉花、小麦、烟叶、豌豆、粉皮、粉条次之。进口以糖、盐、煤油为大宗，洋广杂货次之。更次则为樊城，出口货棉花、烟叶、杂粮、芝麻、牛羊皮均占大宗。进口货棉纱、疋头、靛青、香烟、糖、盐、洋广杂货皆达巨额……再上即达老河口，地为陕南、川北及鄂豫西边一带之经济中心，户口殷繁，商旅辐辏，百货云集，市肆喧闹，实本省北部之大商场。其大宗进口货为疋头、棉纱、糖、盐、香烟、杂货等物巨量，出口货为药材、生漆、牛羊皮、烟叶、棉花、棉油、桐油、杂粮等品，其他零星土产不胜缕指。^①

大致而言，尽管进口货物类别趋同，但是樊城输出的商品以杂粮、棉花居多，而老河口则以山货、棉花、桐油为主。几乎与此同时，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在汉水中游的经济调查报告《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提供了详细的数据统计，与其他档案调查相结合，可以估算出樊城和老河口进出口货物量，并进行比较，考察大宗商品的流通结构变化对于地区商业中心转移的影响。

附带说明的是，东津和张湾都是樊城的附属口岸，居其下游。在

^① 《武穴票总刘智调查报告》，1935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39-1-477。